

费孝通

民族研究文集

FEIXIAOTONG
MINZUYANJIUWENJI

民族出版社

费 孝 通

民族研究文集

民 族 出 版 社

费孝通
民族研究文集

*

民族出版社出版 民族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 1/4 字数：300 千

1985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册 定价：5.75元

ISBN 7-105-00712-5/C·3

(汉1)



费 孝 通

出版说明

长期以来，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事民族科学研究，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发展民族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是我国民族科学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老一辈民族研究工作者在民族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陆续编辑出版《民族研究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能促进民族科学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套《文集》是个人论文选编，不是全部论文汇集。所选论文力求体现老一辈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凡已出版的长篇专著均不收入。所收论文基本局限于作者在民族科学研究方面，涉及其它学科除个别外，一般均不收入。

这套《文集》中所收论文在编排上以写作或发表日期的先后为序。内容上不做重大修改，只在个别文字上作些订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的还做了题解和注释。题解在各篇第一页下边，注释附在篇末。

FH55/08

自序

从我过去50年里所写的有关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文章中，选出了一部分编成一本文集出版，这个建议是大约3年前刘俊同志向我提出的。她还表示愿意担任这本书的编选工作。我当时尽管心里有些犹豫，看到她那样的热情，实在不好意思否决。这几年，她常常一清早兴匆匆地从城里赶来郊外，趁我还没有出门前，抓住时间跟我商量有关收集我早年所发表的文章的问题。我早年的文章大多已经散失，收集不易。她又这样不怕麻烦地寻找抄印，使我更难向她拨冷水了。去年冬季，全书编就，为了慎重起见，又请中央民族学院的索文清同志替我重读了一遍，作了一些增删。事竣，出版社要我写篇序言，我自无法推却了。

一个人能及身见到自己过去所写的文章汇编成册出版发行，应当是一桩值得自慰的事。说实话，10年前我连做梦都不敢有此非分之想的。可是一旦实现，再翻阅一下这些收集起来的文章，其中能自己感到满意的实在不多，这样就不免产生了犹豫的情绪。我心里总觉得在民族研究上欠着一笔帐，至今没有还清，甚至怕这笔帐今生已难以偿付。如果用这本集子来搪塞，我是问心有愧的。

我这种心情，读了本书附录的“学历自述”自会明白。50年前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我欠下了这笔帐。当时我确

曾下过决心要继续研究我国的少数民族，而且要求自己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开放出一朵令人满意的花朵。我想，退而求其次，至少也要能像我在农村社会研究领域里写出一本《江村经济》那样的调查报告来，但至今还是一个未实现的愿望。岁月易逝，筋骨已衰，看来可能实现的机会已经失去，从这种心情来对待这本集子，自谴也必然甚于自慰了。

其实，我这些年所做的研究工作，也不能说完全违背了当年的决心。我所说的民族研究，实际上是指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其中自当包括少数民族的社会研究，所以也可包括在社会学这个学科之内，要突出这部分研究的特点，不妨称之为民族社会学。我这些年的学术工作并没有离开这个大范围，而且最近这几年我正在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

从我那篇“学历自述”里，读者可以理解到我不主张把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区别成两门学科的。在我看来，它们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人类的社会。西方的学科分类有它的历史原因，他们认为现代工业化的社会 and 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可以分成两门学科去研究，即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自己的学术实践就在消除这个偏见，而把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上。说得具体一些，我过去的中国农村研究正是从我所学到的社会人类学的基础知识上发展出来的。我在研究江村时所用的方法实际就是我曾用来研究广西金秀花蓝瑶的方法，而且通过比较不同社区的材料，我写出《生育制度》这样的专

题讲稿。

我心里感到内疚的是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并不像对汉族地区的农村研究那样深入。我1935年负伤离开广西大瑶山以后，研究的对象就转移到了家乡和内地农村，直到1950年我才参加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工作。我从事民族工作有7年之久，到过的地方不少，接触到的少数民族也不少，但并没有利用这机会在少数民族里蹲点，进行长期的观察和体验生活。往往是走马看花，得到一些印象和一般知识，作为科学的资料严格说来是很少的。这是我对自己的工作不能满意的主要根据。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我没有条件做学术研究，白白丢了20年。80年代我才恢复学术工作，年龄已过70，事实上已不可能和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地进行缜密的观察和深入研究了。我这些年来只能推动和帮助有条件进行这样研究的年轻一代去实现我的愿望了。我曾偕同胡起望等同志重访广西大瑶山，并帮助他们开展调查研究。1983年《盘村瑶族》出版时，我写了一篇长序表达了我对瑶族研究的设想和构思。同时，听到四川有些同志有意开展六江流域的民族综合调查，我尽力予以支持，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取得成果，或者说，力虽不及，心向往之。

1984年，我重建社会学的工作告一段落，辞去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职务。这样，使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到各地去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在沿海地区进行农村和小城镇的调查同时，我提出了边区开发研究的课题。边区开

发研究其实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在过去的3年里，我在内蒙古和甘肃，都开拓了研究课题。在这些课题上，我承担破题和开路的任务，就是我先到一个地区作初步的访问和观察，结合当地已有的调查研究材料，找出这地区在社会经济上的特点和发展上存在的问题，整理出一个研究方案，组织各研究机关的年轻同志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为了便利和其他研究机关取得联系和合作，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对外亦称社会学及发展研究中心。这个研究所承担“七五”计划期间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国家重点课题里，就有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这一项目。本集的最后一部分文章就是我在边区开发研究上所做的破题工作。如果天假以年，并能排除种种干扰，现有的研究计划能顺利推进，也许我50年来的欠帐可以在我的余生中偿还一部分。我早年所抱的愿望，则有待于新一代去实现了。

费孝通

1987年2月6日

目 录

桂行通讯	(1)
《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	(33)
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政工作	(39)
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	(44)
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	(72)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的 地区的考古工作	(88)
关于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的意见	(10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工作	(115)
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	(121)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158)
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一些体会	(188)
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	(211)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228)
关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 一些意见	(243)
谈谈怎样开展民族研究工作	(255)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	(268)
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	(286)
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	(295)

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几个问题	(306)
四上瑶山	(317)
《盘村瑶族》序	(325)
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343)
赤峰篇	(350)
潘光旦先生关于畬族历史问题的设想	(384)
包头篇	(390)
人口与开放	(410)
甘南篇	(413)
瑶山调查五十年	(440)
缩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距	(451)
定西篇	(456)
海南岛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	(477)
附录	
学历自述	(497)
费孝通主要著译目录	(504)

桂行通讯

(1935年10月)

说明：作者1935年8月同前妻王同惠赴广西进行实地调查。他们从北平出发，乘坐火车、轮船，经过无锡、上海、香港、广东，后到达广西，从柳州以东象山大藤瑶山开始，于11月18日进山。12月16日在完成花蓝瑶地区调查工作转移地点时，发生了意外事件，作者不幸误踏陷阱，王同惠溺水身亡。这是他们在瑶山进行实地考察时，写的几篇报导，连载《北平晨报》。——编者注

一 到南宁

我们到南宁刚是“九·一八”，在到省府去的公共汽车上，见到一排排制服整齐、列队张旗的民众团体，在街上游行，这是我们在北方好久不见的景象了。

在没有到广西之前，朋友们都同我们说，广西是一个谦虚、好学、有为的小弟弟。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广西并不后于他省。但是因为以前交通不便，地处偏僻，文化建设在各方面比黄河长江下游诸省，年龄上似乎轻一

些。我们来到之后，就体悉到“谦虚”、“好学”和“有为”的意义了。到此虽不久，但是和行政当局及其他民众，已有一些接触，在他们灰色的制服、简单朴实的轮廓上，的确描出了一种刻苦不尚浮华的性格；谈话总带着一种急于求知、自觉不足的态度，这种态度致使我们自愧到不知对答。这并不限于行政领袖，而是一般人员的态度，就是其他如报馆记者，亦有于百忙中找我们谈话的，讨论广西的苗瑶，津津有味，全不象其他专以采访塞责者可比。

南宁的市政还正在建设整理之中，街道宽阔清洁不亚于北平，但是令人感觉不便的是交通工具的过于缺乏。全市只有公共汽车四辆，而且时常损坏，所以想搭一次车，竟有等过半小时者。在街头站立，视见行走的人，虽有自用汽车，但都限于公务人员之用，其他车子极不易见，多徒步往来。即连搬运货物，亦都由人担负，极不经济。曾见一人挑砖头，一担只挑二十余块，人工之费可见一斑。原因是市的设备和它的功能没有调适。南宁本不是一个大会。自从省府搬入之后，人口骤增，活动日多，原有设备，自不免捉襟见肘了。市政问题，如象住宅、自来水等都很严重，房租之贵超过广州、上海。若是把住房户和房屋数统计出来，数目一定是惊人的。我们到晚上在街上散步，常看到拥挤不堪的情形，有似庙会。我曾向同惠说，香港的灯市，南宁的人市，是我这次南来两个最深的印象。这种情形也是出于住宅问题的失调。——这些都是研究都市社会者很值得观察的材料。

南宁生活费用很贵而生活享受很薄。一切外埠运进的

货物，除了很大的入口税外还要加上很大的运费。这种情形使我们想到吴景超先生所谓“发展工业以救农村”，自有实际的道理。以前南宁米价有十五六元一担（合五十公斤）的数目，现在小火轮和汽车道修筑后，米价已减轻了一半。在一个农村或内地都市已失去其自足性质时，要减低该地的生活费用，或救济该地贫穷，发展交通工业是一个重要而切当的办法。

二 到大麻村去

大麻村是在桂省国民基础教育中心区里，23日教育厅长雷沛鸿先生约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从我们所住的旅馆去，汽车要走十几分钟，是南宁郊外的一小村。他们是在一个实验小学里开会。地址靠飞机场；旷野一片，独立着白色的小屋，很能表现它奋斗的精神。

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开会了。很多人一上一下的正在那里踊跃讨论国民基础学校的经费问题。参加讨论的除了国基教育研究院同人和学生外，民政和教育两位雷厅长都出席。广西民众、公务人员、行政长官间亲密的空气，使我极受感动。无怪乎人们都称广西模范省了。

雷厅长约我向在会的同人报告一些来桂的目的和研究计划，但是因为时间太短，所以只能略述一些民族学对社会建设可能有的贡献。大意是说，民族学在中国虽是一个

新名词，但是它的内容却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学者极注意的学问。好象各地方的志书、各地方的通考，都是以记述文物、典章、制度、民情及风俗为目的的。但是在方法上过去的确不甚讲求，所以我们现在应当利用新方法来扩充及整理旧有的学问。

三 “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计划”

以下是我提交省府审议的研究计划书：

广西省，依其民族所操之语言，似可分为三大区，即官话区、白话区（即粤语）及土话区（即壮话及平话），各话之来源流别及分布情形尚无专门研究，但根据普通常识，官话区处东北，白话区处东南，土话区处西部。此次研究工作，因限于时间，拟就此三区中，择一为范围，以后如再有机缘，次第研究其他区域。选择之标准则以研究便利为主，因为三区中在研究之价值及兴趣上言，固无可分高下也。研究工作的便利，首在语言上相通，尤其研究苗、瑶等特种民族时，若与当地之汉人言语难通，翻译上即感困难。余此次尚属初次南来，粤语犹未能通晓，故拟择官话区为范围。

人种研究之目的，除以正确数量规定人种体型类别外，尚可藉以明瞭中国民族扩张、迁移之大势，及各族分

布交融同化之概况。其方法则赖人体测量术，遍量人体各部之长宽、周围、色彩、形状，然后用统计方法加以分析，以获结论。所用材料则无分汉、苗，均应搜集；汉人测量时拟用民团为材料，因民团为当地人民，既加编制，又受调练，且有纪律，工作易于着手（今年春季曾应驻北平第32军之约，调查该军体格，故有此经验）。且此项材料非但于研究人种上有用，在军队编制及训练上，也有功用。苟与去春材料比较分析，更可借以明瞭吾国南北军人体格上之差别，亦军事上一重要问题也。民团之外如学生及其他工人等团体，能有机会，亦愿加以测量。因社会中各团体、各职业，即以体格论，亦有差别，此即所谓社会选择也。

至于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之研究，则拟首重行政组织，即省县政府治苗实况，与土司对苗之统治情形。因此次研究期限急促，不能不择其与省行政上有密切关系之问题为主，并拟以客观态度贡献对待特种民族之意见，以备采纳。方法除与相关政府询问调查考核外，并拟介绍诸可靠之瑶酋土司，俾得直接住其地，更以局内观察记录其人民，家庭，市集之组织，与夫风俗、习惯、美术、宗教及其他种种文化特性。

四 在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

广西省府称苗、瑶、侗、壮等人民作“特种民族”。

特种民族的人口全省约有70万，所以在行政上、教育上，很需要特别注意。教育厅有一个特种教育委员会，专门担负设计特种民族的教育事宜。该委员会办有一个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由各县遣派当地特种人民来省训练，使其成为彼等人民的中心力量。该所现为刘锡蕃先生所主持，刘先生即《岭表纪蛮》（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的作者，对于该问题有极丰富的经验和极深刻的了解，闻不久有详细著作出版，实是中国民族学界的好消息。

该所现在有学生两班，约100多人。初级班尚未开学，所以在校的只有40余人，学生中瑶、苗、侗、彝都有，而以瑶属为最多。

我因为在南宁尚有几天耽搁，所以到该所去酌量学生的体格，一共费了两天，测量了48人，瑶30人，苗5人，僮（彝）4人，侗1人，瑶体高平均157.56厘米，头形指数平均81.53。其他因为数目太少未算，他们在体高和头形指数的系联表上所处的地位颇近于高丽华东人民，似多B类，现在材料尚少，不敢作何结论，但此已引起我们极有意义的推想了。

9月25日于南宁。